

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 「八月事件」正劇

• 沈志華

摘要：赫魯曉夫推動的「非斯大林化」鼓舞了朝鮮勞動黨內的反對派幹部，他們趁1956年夏天金日成出訪之際，相互串聯，準備在即將召開的中央全會上批判金日成。金日成回國後，立即得知了反對派的情況，一方面採取各種手段予以分化瓦解，拖延中央全會的召開；另一方面與蘇聯使館頻繁接觸，以求支持。此時批判斯大林引發了蘇聯和東歐社會的思想混亂，赫魯曉夫不想東方再出現不穩定局面，因此對金日成採取了容忍的態度。金日成在隨後召開的中央「八月全會」取得勝利，將反對派主要成員開除出黨、撤職查辦，導致一批幹部逃亡中國。

關鍵詞：金日成 朝鮮勞動黨 「八月事件」 蘇朝關係 中朝關係

1956年，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及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批判，對金日成在朝鮮的統治產生了負面影響，從而遭到朝鮮勞動黨（以下簡稱勞動黨）的抵制。勞動黨內部對金不滿的幹部，受到「非斯大林化」的刺激和鼓勵，趁金在當年夏天出訪蘇聯、東歐及蒙古之際紛紛串聯，形成反對派，準備通過政治鬥爭的方式批判金，甚至迫使其下台。就在批金倒金的秘密政治鬥爭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金日成於7月19日回國了^①。本文利用最新解密的俄國檔案及中方相關資料，再現1956年8月勞動黨內政治鬥爭的全過程，並提出一些與以往研究者不同的判斷和看法。

一 反對派積極活動

關於金是何時及如何得知反對派正在策劃「陰謀」的，有當事人回憶說，金在國外時就已經從崔庸健或蘇聯外交官那裏得到了消息^②。而金本人在回

憶錄裏說，是回國後他的副官長李乙雪和外務相南日向他報告的^③。這裏還有一個情況值得注意，在回國途中，金於1956年7月13日離開莫斯科去蒙古，直到19日才返回朝鮮，就是說他在蒙古及回國途中整整耗費了六天^④。如果這時金已經知道國內有人準備「篡黨奪權」，很難想像他還會為幾萬頭牛羊悠閒地與蒙古人談判。俄國檔案披露的情況也證實，金的確是在回國後才發現危機已經迫近，而南日就是向他通風報信並協助折解危機的主要人物之一。

7月20日，金日成會見了朝鮮黨和政府的其他領導人，除向他們通報了出訪情況外，還專門談到「波蘭事件」。金指出波蘭危機的出現，就是因為領導人過於關注個人崇拜問題，而沒有注意知識份子的「危險思潮」^⑤。金顯然是在提醒大家，事實證明，正是「非斯大林化」導致了政治上的不穩定，從而為自己的方針辯護。就在這一天，朝鮮政治不穩定的消息就傳出來了。根據南日7月24日向蘇聯使館臨時代辦彼得羅夫(A. M. Петров)通報的情況，7月20日「蘇聯派」幹部朴昌玉來到南日家中，開門見山地告訴他，內閣副首相崔昌益、建設相金承化以及他本人等一批領導幹部，打算在即將舉行的中央全會上嚴厲批評金日成的領導方式、個人崇拜等錯誤。為了爭取南日加盟，朴昌玉說，他們會取得多數領導幹部的支持，甚至不排除崔庸健也會加入對金日成的批評。南日向蘇聯人表示，他個人認為這種做法不可取，會「導致不良後果」；在黨員和人民中間「醜化金日成」，會引起政治混亂。而金已經認識到自己的錯誤，並且正在採取措施改正。隨後南日表示，至於是否將此事告訴金，令他感到很為難。彼得羅夫表態說，聯合批評金這件事值得高度關注，朴昌玉採取的立場明顯是不正確的，這樣做可能會在國內外引起不良反應。彼得羅夫建議南日應勸說朴昌玉、金承化放棄這種做法。至於是否向金日成通報，彼得羅夫說這是南日自己的事情，但又說如果這樣做，最好不要提到具體人名。南日立即表示同意，並自告奮勇將幫助金準備自我批評的發言^⑥。由此可知，朴此時已經參與了反對派的活動，並承擔了聯絡蘇籍朝鮮幹部的任務。另外，毫無疑問，金馬上就得知了全部消息。

隨後幾天，反對派的活動緊鑼密鼓地展開了。7月21日，朴昌玉告訴蘇聯參贊菲拉托夫(C. H. Филатов)，在下次中央全會上，將對金日成進行集中批評^⑦。7月23日，崔昌益拜訪蘇聯使館，也通知菲拉托夫，「在未來的中央全體會議上金日成將會受到尖銳批評」^⑧。7月24日，金承化告訴菲拉托夫，他最近兩次與「延安派」的精神領袖、最高人民會議議長金科奉談話，詢問他對在中央全會批評金日成一事的看法。金科奉表示很高興看到這樣的行動，因為金日成不想改正自己的錯誤；但他認為很少人會下決心反對金日成^⑨。關於這些情況，後來逃亡中國的職業聯盟委員長徐輝等人向中共中央報告說，金日成回國後不久，菲拉托夫曾通過金承化與崔昌益、李弼奎、徐輝、尹公欽等人見面，表示同意他們的觀點和做法，甚至說「為了消除朝鮮勞動黨內的個人崇拜及黨的工作中的嚴重缺點，必須要很好地組織鬥爭」，並把蘇共中央主席團在莫斯科與金日成會談的內容以及金已承認錯誤的情況透露給他們。徐輝等人在報告中說，「我們很受鼓舞」，因為沒有兄弟國家的支持，

去批評大權在握的金日成只會導致無謂犧牲，但有了蘇聯的支持，就可以制止金的獨裁^⑩。然而，在俄羅斯著名朝鮮問題專家蘭科夫 (Andrei Lankov) 引用的有關菲拉托夫的三次談話紀要中，根本沒有這些內容^⑪。儘管筆者沒有看到這些文件的原文，但相信如果文件中提到如此重要的信息，蘭科夫一定不會放過。從前面所引彼得羅夫與南日談話中的表態來看，蘇聯外交官中即使有人同情反對派，也不可能如此直白地表露出來。徐輝等人這樣說，很可能是在「八月全會」鬥爭失敗後為自己採取的魯莽行動尋找理由，以便給中共中央一個合理的解釋。

在反對派積極活動的時候，金日成及其支持者也沒有閒着，他們對即將到來的挑戰進行了充分準備，並且按部就班地展開了行動。首先，當然是要取得莫斯科的支持。與反對派相比，金日成、南日等人與蘇聯使館保持着更加頻繁、也更直接的聯繫。除了外交場合的見面和會談，應朝方的邀請或要求，彼得羅夫7月24日到外務省會見南日，7月26日與金日成進行會談，7月28日拜會南日和朴正愛，8月1日與南日進行會談^⑫。儘管這些已通過電報送交莫斯科的「特別會談記錄」目前尚未完全解密，但可以肯定其內容與朝鮮政治有關。很快，蘇共中央就有了答覆。根據莫斯科的指示，彼得羅夫8月2日約見金日成，並向他通報了莫斯科來電的內容，其主要精神是「在批評朝鮮勞動黨中央工作和政府活動的失誤的過程中，金日成應當主動地有所表現」^⑬。

7月30日，勞動黨中央召開了一次幹部會議，中央各部負責人及一些內閣成員出席。朴金喆和朴正愛分別在會上發言，內容大體相同。他們首先承認在勞動黨內確實存在着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的現象，黨在幹部任免工作中也犯了一些錯誤。但他們一致認為，對金的崇拜並不像蘇聯對斯大林的崇拜那樣已經發展到危險地步，而且黨目前正在採取措施準備糾正錯誤。所以，對於個人崇拜的問題沒有必要進行全面討論，領袖和黨不會允許出現任何可能削弱黨的力量的分裂行為。他們在發言中還透露，實際上對於蘇籍朝鮮幹部的打擊主要來自「延安派」幹部；蘇共領導人不會干預勞動黨的行動^⑭。這兩個明顯是金授意發表的講話，自然是為了安撫受到排擠的「蘇聯派」幹部，以分化反對派的隊伍，同時也告誡那些不安分的人不要輕舉妄動，莫斯科是不會支持他們的。為此，8月1日的《勞動新聞》還發表了長篇社論，中心意思是個人崇拜應該受到批判，但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以免被階級敵人所利用^⑮。

二 金日成部署反擊

為了控制局面，金日成還採取了兩項措施：第一，要求正在蘇聯的內務相方學世迅速回國，採取措施防止可能發生的緊急狀況；第二，推遲召開原計劃於1956年8月2日舉行的中央全會，以便做好更充分的準備。隨後，金日成、金一、崔庸健和朴正愛分別找朴昌玉、崔昌益和金科奉談話，了解他們的意圖。

伊萬諾夫(В. И. Иванов)大使從蘇聯返回平壤後，8月6至8日，金日成、南日和朴正愛相繼要求會見，匯報情況。根據他們的報告，反對派的成員有金科奉、崔昌益、徐輝、高峰起、李弼奎、尹公欽、金承化和朴昌玉，而將受到攻擊的人有金日成、朴正愛、鄭一龍、朴金喆和金昌滿等。他們在談話中承認工作有錯誤，並願意承擔責任。金日成甚至對金科奉說，為了黨的利益，如果需要的話，他準備辭去領導職務。但是，金科奉、崔昌益堅持要他罷免朴正愛、朴金喆、鄭一龍、金昌滿、鄭准澤等人的領導職務。朴正愛還指出，所有對黨的不滿和指責都是崔昌益鼓動的，背後的活動也是他一手策劃的；金科奉與崔昌益的老朋友朴昌玉也參與進來。金承化則充當崔昌益與其他反對派成員內部之間的聯絡人，中央已決定調他去莫斯科學習。在談話的最後，伊萬諾夫根據8月2日莫斯科來電的指示精神，分別對金日成、南日和朴正愛發表了內容大致相同的看法：勞動黨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勇敢地、堅持原則地揭露黨的領導層工作中的失誤，主動地開展批評，正確地分析那些不滿意見產生的客觀原因，採取切實的措施在實際工作中逐步彌補不足，從而鞏固黨的領導地位。與此同時，對那些揭露問題、提出意見的幹部不能進行壓制，更不能採取黨紀處分的手段，以免激化矛盾，使黨陷入更加危險的境地。伊萬諾夫在日記中寫到：與金日成的會談表明，他對勞動黨內部存在的不滿情緒感到憂慮，並清楚地意識到這種不滿情緒有着深刻的根源：「我認為，朝鮮朋友在全會開幕全面討論前採取措施以取得中央常委會在這些問題上觀點統一的做法是正確的，因為只有這樣，此次全會才能夠在更廣泛和更健康的黨的基礎上討論朝鮮勞動黨領導層的所有失誤，並採取措施制訂出清晰、明確的清除這些錯誤的行動計劃。」^⑥從伊萬諾夫的日記可見，此時金日成已經取得蘇聯的支持；儘管督促他採取主動態度承認錯誤、改正錯誤，但莫斯科明顯不希望看到勞動黨領導層出現不穩定的局面。

從1956年4至5月對金日成抵制蘇共二十大路線的極度不滿，到8月初對勞動黨穩定局勢種種措施的明確支持，莫斯科的態度發生了很大轉變。這種轉變並不是因為對金的看法有了新的認識，而是受到了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因素的影響。4月5日，面對赫魯曉夫(Н. С. Хрущев)「秘密報告」引發的衝擊，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了長篇理論文章〈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既肯定了蘇共二十大的歷史功績，特別是揭露個人崇拜問題的勇氣，又明確主張對斯大林的功過應該作三七開評價，承認他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其目的就是替赫魯曉夫「補台」，消除社會主義陣營內部思想混亂的局面^⑦。蘇共對此很重視，專門印發了二十萬冊單行本，讓黨員幹部學習^⑧。6月28日，波茲南爆發群眾遊行和工人罷工，波蘭政府採取了武力鎮壓的措施。事件雖然平息下去，但在社會主義各國引起很大反響，也令蘇聯領導人感到十分擔憂^⑨。6月30日，蘇共中央做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強調在批判個人崇拜錯誤的同時，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基本接受了中共的理論觀點^⑩。7月12日，面對匈牙利因「波茲南事件」引發的黨內危機和抗議活動，蘇共中央主席團不得不決定逼迫匈牙利勞動人民黨總書記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退休」，以平息黨內外的「激昂情緒」^⑪。在如此多事之秋，

莫斯科自然不希望再看到社會主義的東方發生危機和動亂。金日成又一次受到命運之神的眷顧。

8月13日，伊萬諾夫主動拜訪金日成，向他介紹了剛收到的蘇共中央來信的內容，主要是關於蘇共二十大決議討論和執行的情況。金在會談中表示，經過他詳細了解情況後發現，黨內對領導層不滿的只是個別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徐輝。在言談中，金日成也流露出對金科奉的不滿。伊萬諾夫注意到，金日成和南日對莫斯科來信中譴責蘇共黨內個別反黨言論的內容頗感興趣，金尤其感到滿意的是信中的結論及相關內容，即「黨內民主不應被用來作為工具以達到損害黨、破壞和削弱黨的紀律的目的，不應被用來傳播對黨的領導層及其機關和骨幹不信任的情緒和言論」²²。在這次會談以後，金立即在朝鮮黨內傳達了這些信息²³。勞動黨內的局勢也逐漸明朗了，金完全掌握了主動權，並充滿了勝利的信心。

8月18日，金日成召集中央常委會，通報了蘇共中央來信的內容，暗示蘇聯對批判個人崇拜的態度已有所改變。崔昌益的反應強烈，情緒有些激動；金科奉發言比較克制，只是希望中央常委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黨內問題。聽了南日關於上述內容的通報後，伊萬諾夫建議他應深刻領會蘇共中央來信的指示精神，端正對批評者的態度。勞動黨中央應該主動把問題擺出來，揭露錯誤，開展批評，找到產生錯誤的原因，而不要本末倒置，把主要精力用來調查反對派的活動²⁴。

根據南日和朴義琬的報告，8月21至23日，勞動黨中央常委會開會討論黨內存在的問題。在金日成的開幕詞後，崔昌益首先發言。他指出在勞動黨內部存在着個人崇拜現象，缺乏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幹部選拔不是根據其業務素質和能力，而是對領導人是否忠誠。他建議解除朴金喆副委員長的職務，並根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對鄭一龍和金昌滿進行審查。接着，朴金喆、金昌滿、金一和林海先後發言，一致對崔昌益進行了嚴厲批判，他們都特別強調一點，即崔的行為是直接反對金日成的，企圖在國家領導層內部製造紛爭和削弱黨的力量。金科奉的發言比較平和，但也認為朴金喆等人不能勝任所擔負的職責，在黨內有必要開展反對個人崇拜的鬥爭，實現真正的集體領導。對於朴金喆等人的發言，金科奉認為不應一味地指責批評者，而應對其所提出的問題進行討論。會議期間，金日成找朴義琬進行了三個小時的單獨談話，要求他在會上保持中立，不要對黨和政府進行批評，並希望他支持朴金喆。在最後一天的會議上，南日發言對崔昌益進行了「徹底批判」，金科奉則改變了態度，提出不要抓住一些幹部的歷史問題不放，還建議撤銷崔昌益的職務（南日就此評論說，金科奉已經退出崔昌益集團）。金日成最後發言表示，他認同這樣的看法，勞動黨領導層的確存在着錯誤和不足，並將採取措施予以清除，但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對於一些領導幹部的職務問題，因證據不足不予撤換；會議決定8月30日召開中央全會。朴義琬還反映了一個情況，即國家安全部門已經對某些幹部使用了「警察手段」，他們身邊的工作人員也遭到審問。伊萬諾夫在分別聽取南日和朴義琬的匯報後發表了意見，他認為會上對黨的領導人提出的批評意見基本正確，絕不能對批評者採取任何

過激手段，把批評人說成「懷有敵意的反黨集團」也是不對的。伊萬諾夫還建議朴義琬勸說金日成主動進行自我批評，採取措施改正錯誤，從而鞏固勞動黨的領導地位²⁶。可以看出，此時蘇聯使館的擔心，已經不是反對派要採取過激行為，而是金要使用嚴厲手段排除異己。無論如何，其結果都會激化矛盾，釀成危機。

8月28日，朴義琬造訪蘇聯使館，通報了當天勞動黨中央常委會開會的情況。會議通過了金日成將在中央全會所作報告的草稿，金料奉和崔昌益認為，報告應該更多地談到個人崇拜及其嚴重的危害，而壓縮關於派別活動的內容。朴還說這些天來，金日成、朴正愛、金一、南日和方學世紛紛找他談話，極力勸說他不要在中央全會上提出「那些已經十分緊迫的問題」，「不要摻和到這些爛事裏」。朴指出，現在已經出現了要壓制那些不服從的領導幹部的苗頭，如把金承化調去蘇聯學習。金日成還對朴威脅說，如果那些人還要在會上繼續發言反對國家領導人，那麼中央手裏掌握的有關他們的材料就派上用場了，而且大家都清楚，金可是莫斯科支持的人啊²⁷。

但金日成向伊萬諾夫所談8月28日常委會開會的情況卻很不相同。他說報告草稿得到常委會一致稱讚，崔昌益認為報告中關於個人崇拜問題提得很尖銳，金料奉也同意報告的內容。常委會的核心是討論幹部問題，而非個人崇拜問題。研究表明，對朴正愛和朴金喆等人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金料奉也同意這些問題不提交中央全會討論。金日成還說，常委會的結論是，某些人指責中央領導人的目的是破壞黨和國家的領導層。金日成甚至還暗中向蘇聯大使施加壓力：金料奉說他所提出的幹部問題曾「得到兄弟黨的支持」²⁸。如果留意到金日成的談話是在9月1日，即充滿激烈鬥爭的中央全會已經閉幕，且金大獲全勝，那麼就可以理解他與伊萬諾夫的談話內容為何同朴義琬所說的情況存在如此差別，以及他為甚麼敢於暗示蘇聯大使不要再干預朝鮮事務。

關於此期徐輝、李弼奎等反對派骨幹份子的活動，檔案材料中沒有任何反映。不過可以判定，金日成及其支持者頻繁與蘇聯使館接觸，反覆找一些持中立態度的幹部談話，又對可疑人士採取監控措施，在這種情況下，反對派的活動空間已經十分狹小。即使他們想採取甚麼行動，也是孤掌難鳴了。8月30至31日的中央全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反對派勢單力薄，只能孤注一擲。會議的過程很簡單，結局也是可以預料的。

三 「八月全會」的召開

1956年8月30日中央全會開幕，金日成首先作報告。與以前黨內文件或講話相比，這個報告不同的地方是用很大篇幅討論了個人崇拜問題，相同的地方是依然只談蘇聯的個人崇拜和朝鮮對朴憲永的個人崇拜，而對領袖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問題，只是在談到宣傳工作時順帶提了一下。報告強調，「最近幾年黨中央委員會對糾正與個人崇拜相關的現象極為重視」，還特別指出，

「個人崇拜絕對不是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上產生的，也不是敵人喜歡斷言的那樣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弱點」。像以往一樣，報告批評的重點是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以及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表現²⁸。報告後進行大會討論，在第二個發言以後整個會場馬上就陷入一片混亂，還出現了很多激烈爭鬥的場面。關於「八月事件」的情況，檔案文獻中不同的人有不盡相同的說法，而當事人的回憶更是五花八門。檔案材料有金日成、朴義琬分別與伊萬諾夫的談話，徐輝等人給中共中央的信，李相朝給勞動黨中央的信，勞動黨中央產業部部長高熙萬與蘇聯駐朝使館一等秘書薩姆索諾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的談話，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與勞動黨代表團的談話，以及伊萬諾夫關於「八月事件」的報告²⁹。學者經常引用的口述史料則來自原勞動黨中央書記林隱(許真)、原金日成秘書室主任高峰起、原內務省副相姜相浩、原駐蘇大使李相朝及蘇聯使館朝文翻譯金楚雄等人³⁰。經過梳理和對比，筆者以為朴義琬對蘇聯使館講述的情況比較全面、客觀，因而內容比較可靠。故以下所述，除特別說明外，主要取自朴的談話。

在中央全會上，首兩個發言者，即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李鐘玉和咸鏡北道委員長金泰根的發言，除了歌功頌德，沒有甚麼實際內容。第三個站起來的是貿易相尹公欽，根據俄國檔案中保存的發言稿，尹的發言開門見山地提出了揭露黨內生活及工作中嚴重的缺點和錯誤的問題：個人崇拜思想廣泛蔓延，批評和自我批評遭到壓制；有人溜鬚拍馬，有人濫用職權，有人專橫跋扈。接着，尹指名道姓地講述了許多具體問題，金日成、金昌滿、韓相斗、朴金喆、朴正愛、李一卿等人都在批評之列。發言是圍繞着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展開的，涉及範圍之廣，具體內容之細，實為有關這一問題的文字材料中所罕見。尹最後向黨中央提出兩點建議：保障黨內民主，制止以各種方式壓制批評；將金日成個人崇拜問題交全黨討論³¹。

不過，尹公欽的發言並沒有講完。當他剛提到勞動黨內的嚴重問題時，金日成就打斷他的發言，指責尹是在誣衊黨。尹的隨後發言不斷被人插話、打斷：「你是在誣衊」，「難道朝鮮勞動黨是法西斯或資產階級政黨」，等等。當尹點到崔庸健的名字時，崔站起來大罵尹是「狗崽子」，還使用了各種侮辱性的語言，甚至要上前揍他(徐輝語)。此時支持尹的崔昌益起身想發言，但沒有得到允許。尹的發言講到一半時，被迫中止(崔庸健語)。金提出，沒有必要給反黨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繼續發言的機會，應該立即停止討論。隨後大會對此建議進行表決，結果大部分同意，七票反對(徐輝語)，然後休會。復會以後，尹等人沒有再回來。大會當場通過決議，開除尹的黨籍(林海語)。

接下來的發言就是對尹公欽及其他反對派幹部的嚴厲批判或為金日成辯護，依次發言的有財政相李周淵、南日、青年聯盟委員長朴容國。隨後崔昌益發言，他不否認黨的政策正確性，但認為個人崇拜也是黨內的大問題。他的發言也數次遭到質疑。接着平安南道委員長金萬金發言，提議對以崔昌益為首的反黨集團展開調查，並把他們全部關進監獄。以後，金昌滿、咸鏡南道委員長玄正民、李一卿、崔庸健相繼發言，不僅針對尹公欽，還點名揭露和批判崔昌益、朴昌玉、徐輝、李弼奎。朴昌玉最後要求發言，想為自己

辯白，也被一片抗議聲所打斷。金日成在結束語中要求對崔昌益和朴昌玉採取組織措施，大家一致贊同。

當天休會後，徐輝、尹公欽、李弼奎三人回家，發現電話線路已被切斷，形勢不妙。他們找到時任文化省副相的金剛（原朝鮮義勇軍鴨綠江支隊政委）商議，於當晚駕駛一輛軍車，直奔中朝邊界的鴨綠江大橋，逃亡中國^⑳。在第二天繼續召開的會議上，大會一致通過了〈關於崔昌益、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朴昌玉等同志的派別和陰謀活動〉的決議，歷數罪狀後，宣布將他們開除出黨，撤銷黨內一切職務，並建議內閣撤銷他們的一切行政職務，又責成監察委員會對崔昌益、朴昌玉及其他有關人員進行調查^㉑。按照朴義琬的說法，會後整個國家陷入大規模的搜捕和嚴厲鎮壓之中^㉒。「八月事件」到此告一段落，金日成大獲全勝。

筆者把上述過程和情況歸納起來，提出以下幾點看法，與學界同仁商討：

第一，以往關於「八月事件」的描述，多把發起者稱為「延安派」，此議不妥。其一，勞動黨內各派，除「南方派」以外，「延安派」和「蘇聯派」並沒有形成真正的派別，也沒有組織活動^㉓；其二，原有各派幹部內部即使有一些個人之間的聯繫，經過幾次政治清洗和重新站隊，到1956年初早已打亂了原來的幹部結構，4月勞動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勞動黨三大）時領導機制的形成就很可能說明問題；其三，反對金日成的骨幹力量當中，固然「延安派」人數為多，但也有「蘇聯派」和「國內派」不少人，如朴昌玉、金承化、高峰起等；其四，金的支持者當中，也不乏原「蘇聯派」、「國內派」甚至「延安派」的幹部。既然不能證明「延安派」在這次事件中單獨成立了地下組織，或以該組織為核心發起了反對金的行動，那麼就很難把這次政治鬥爭說成是「延安派」組織或指揮的。其實，這次政治鬥爭是所有對金及其支持者不滿的幹部策動的，所以將他們統稱為黨內「反對派」可能比較合適。

第二，反對派的核心人物的確是原「延安派」的幹部，即徐輝、尹公欽和李弼奎。剛一發現苗頭不對，首先逃跑的就是此三人（金剛只是協助逃亡者），這很可能說明問題。崔昌益、朴昌玉、金承化、李相朝都積極參與了這場鬥爭，但似乎還不是策劃者或中心人物。金科奉只是外圍人物，是反對派積極爭取的對象。最不合理的，是把崔庸健認定為反對派努力爭取的中心人物，甚至把反對派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崔的「出賣」或「背叛」^㉔。崔一直是金日成的追隨者，特別是金在1955年力排眾議，把他推上中央副委員長的寶座，1956年出國時又委託他鎮守國內，這些情況所有幹部都看在眼裏，反對派怎麼可能對崔寄予厚望，而把身家性命交與一個金的心腹？當事人的這種說法，不過是為了爭取支持而壯大聲勢，或為鬥爭失敗推脫責任。

第三，關於「八月事件」的性質，應該說是一次黨內合法的政治鬥爭。首先這肯定不是後來勞動黨給反對派定罪時所說的「軍事政變」，反對派手裏既沒有軍權，也不掌控警察，如何組織和發動武裝政變？其次把反對派的活動說成是「反黨陰謀」也沒有根據，他們的活動幾乎沒有甚麼秘密，一方面不斷向蘇聯使館報告，爭取支持；另一方面到處游說，發動各種反金日成的力量，哪還有甚麼「陰謀」？他們最初是希望通過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最傳

統的黨內鬥爭方式奪取金的領導權，或至少達到「清君側」的目的，只是後來發現既沒有足夠的力量，也無法得到蘇聯的支持，於是只好孤注一擲，在中央全會上公開站出來指責金，試圖在黨內爭取支持，做最後的拼搏。

第四，反對派失敗的關鍵原因，是蘇聯對處理朝鮮黨問題態度的轉變。勞動黨的個人崇拜問題，既是金日成的致命弱點，也是反對派的手中武器。起初蘇聯領導人出於對勞動黨中央抵制蘇共二十大方針的不滿，支持對金的個人崇拜錯誤提出批評，同時也主動找金談話。正是這一消息的走漏（儘管可能不是蘇聯人的責任），給反對派發起行動增強了動力。後來由於擔心社會主義陣營思想混亂、局勢動盪，莫斯科在批判個人崇拜問題上的態度有所軟化，又明確表態反對採取激烈方式批評金，其結果既為金鼓了勁，也給反對派洩了氣，這場政治較量的天平便明顯地一邊倒了——真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最後，關於這段歷史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在其中扮演了甚麼角色？有一些說法筆者很難苟同。姜相浩回憶說，「密謀者與中國大使館有一條秘密聯絡渠道」，有學者據此認為，反對派始終與中國大使館保持着密切聯繫，甚至「整個事件有可能就是由中國煽動起來的」^①。多年後金日成的一個說法更是自欺欺人，他說反對派「敢於鬧，是因為彭德懷給他們撐腰」^②。根據現有史料，可以確定的是，1956年7月蘇聯領導人與金會談後，向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情況。但具體內容不詳，中共也沒有做出反應^③。另據俄國檔案記載，8月3日中國駐朝使館參贊曹克強拜會彼得羅夫時說，「在與中國使館工作人員的會談中，個別朝鮮同志對中國如何對待個人崇拜的問題頗感興趣」，而使館的答覆都是遵循《人民日報》的口徑^④。這個說法與筆者採訪金忠植的記錄完全吻合。在回答「延安派」幹部是否與中國使館進行聯繫的問題時，金忠植說中國使館的態度很冷淡，或者避而不見，或者含糊其辭^⑤。8月17日伊萬諾夫拜訪中國使館，從他挑選的這個會面時間來看，蘇聯人很可能是想了解一下中國對朝鮮政局的立場。但喬曉光大使只談到了一個情況，即關於朝鮮希望中國在五年計劃中提供何種援助，目前仍未向使館做任何通報，有可能會在金日成率團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提出這個問題^⑥。

看起來，中國對當時朝鮮黨內鬥爭的詳細情況似乎既不了解，也不關心^⑦。不過，事情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反對派幹部逃亡中國幾天後，中共中央不僅捲入了勞動黨「八月事件」，而且成為主要角色。於是，勞動黨內部的派系鬥爭便演化為社會主義陣營裏的一場政治鬥爭。

註釋

① 由於版面限制，「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按時間順序分為五個專題六篇文章：「在黨內排除異己」，「八月事件」（上、下），「應對中蘇共同干預」，「毛澤東轉變對朝方針」，「志願軍撤離北朝鮮」。第一、二篇已經刊出，參見沈志華：〈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在黨內排除異己〉、〈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八月事件」序曲〉，《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5年10月號、12月號，頁68-85、84-96。其餘各篇將在《二十一世紀》陸續刊出。

- ②⑩⑪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The Failure of De-Stalinization, 1956*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87-88, 105-106; 79-83; 111.
- ⑬ 金日成：《金日成回憶錄：與世紀同行》，第八卷（平壤：外文出版社，1998），頁269。
- ⑭ 〈朝鮮代表團離蘇赴蒙 平壤集會歡迎金日成回國〉，《人民日報》，1956年7月14日，第5版、7月20日，第5版。
- ⑮⑯ 菲拉托夫（С. Н. Филатов）與崔昌益談話紀要，1956年7月23日，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102, оп.12, д.6, п.68。
- ⑰ 彼得羅夫（А. М. Петров）與南日談話紀要，1956年7月24日，РГАНИ（俄羅斯國家當代史檔案館），ф.5, оп.28, д.410, л.301-303, *CWHP Bulletin*, issue 16 (Fall 2007/Winter 2008), 480-81。
- ⑱ 菲拉托夫與朴昌玉談話紀要，1956年7月21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
- ⑲ 菲拉托夫與金承化談話紀要，1956年7月24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
- ⑳ 徐輝等人給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
- ㉑ 彼得羅夫日記，1956年7月20日至8月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09-14。
- ㉒ 彼得羅夫日記，1956年8月2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3；伊萬諾夫（В. И. Иванов）日記，1956年8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35-37。
- ㉓ 菲拉托夫與尹公欽談話紀要，1956年8月2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п.68。
- ㉔ 〈國際工人運動的重新高漲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思想的威力〉，《勞動新聞》，1956年8月1日，第1版。
- ㉕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6日、8月6日至7日、8月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35-41。
- ㉖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第1版。
- ㉗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蘇聯出版全文的小冊子〉，《人民日報》，1956年7月6日，第6版。
- ㉘ 詳見 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Институт Россий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АН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5, с.217-40。
- ㉙ 蘇共中央主席團就〈蘇共中央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草案〉的決議，1956年6月30日，РГАНИ, ф.3, оп.14, д.39, л1, 30-34;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гла. ред.)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2, с.352-68。中文版參見〈蘇共中央關於克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決議〉，《人民日報》，1956年7月6日，第1版。詳細的分析參見沈志華：〈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係的影響——根據俄國最近披露的檔案文獻〉，《國際冷戰史研究》，第一輯（2004年冬季號），頁28-70。
- ㉚ 詳見 Волков В. К. и т.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1998, с.28-30, 35-40, 85-87; В. Л. Мусатов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г., No.1, с.4-6。
- ㉛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1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41-44。
- ㉜ 波諾馬廖夫（Б. Н. Пономарев）給蘇共中央的報告，1956年9月12日，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5, оп.28, д.410, л.228-32。
- ㉝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1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47-48。

- ⑳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23、24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54-56、356-59。
- ㉑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29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7-19。
- ㉒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1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9-21。朴義琬後來證實，關於「兄弟黨」的說法，金日成完全歪曲了金料奉的意見。金料奉當時說，不應在常委會上研究證人的口供，而應委託金日成與這些證人交談，這樣的方式也是各兄弟黨內部經常採用的。參見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1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21。
- ㉓ 金日成在中央全會的報告，1956年8月30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69-103。
- ㉔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1日、9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9-21, 326-32；徐輝等人給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李相朝給朝鮮勞動黨中央的信，1956年10月5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233-95；薩姆索諾夫(Г. Е. Самсонов)與高熙萬談話紀要，1956年8月31日，АВПРФ, ф.102, оп.12, д.6, л.68；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與朝鮮勞動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6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с, д.718, л.48-57；伊萬諾夫的報告：朝鮮勞動黨八月事件及目前局勢，1956年12月28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86, л.1-17。
- ㉕ 參見林隱：《金日成正傳》(首爾：沃村文化社，1989)，頁276-77；高峰起：《金日成秘書室主任高峰起遺書》(首爾：天馬出版社，1989)，頁86、92-93、97-98；韓國日報社編：《關於金日成的證言——俞成哲、李相朝所揭示的北韓政權實體》(首爾：韓國日報社出版局，1991)，頁118-19、183；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124, 128-30。
- ㉖ 尹公欽在中央八月全會的發言稿，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82-202。尹之所以做如此激烈的發言，根據他們後來向中共中央所作的說明，似乎是因為事先得知金日成將在會上做自我批評，結果發現完全不是這樣，故拍案而起。參見徐輝等人給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76-77。但實際上尹這個措辭嚴厲的發言稿是會前準備好的，所以應該有兩種可能：如果金日成確實認真進行了自我批評，這個發言稿就收起不用了；如果金沒有實現承諾，便以此對他發起進攻；又或者，無論如何都要公開揭露和批判金。
- ㉗ 徐輝等人給中共中央的信，1956年9月5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61-81；米高揚與朝鮮勞動黨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6日；筆者採訪金剛記錄，太原，2010年2月16日。
- ㉘ 朝鮮勞動黨中央全會決議，1956年8月31日，ГАРФ, ф.5446, оп.98, д.721, л.14-25。
- ㉙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9月6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26-32。
- ㉚ 沈志華：〈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在黨內排除異己〉，頁68-85。
- ㉛ 筆者採訪金忠植記錄，太原，2010年2月17日。金時任朝鮮勞動黨平壤市委組織部部長，「八月事件」後逃往中國。
- ㉜ 毛澤東會見金日成談話記錄，1960年5月21日，未刊。
- ㉝ 毛澤東接見蘇共中央代表團談話記錄，1956年9月18日，未刊。
- ㉞ 彼得羅夫日記，1956年8月3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313-14。
- ㉟ 筆者採訪金忠植記錄，太原，2010年2月17日。
- ㊱ 伊萬諾夫日記，1956年8月17日，РГАНИ, ф.5, оп.28, д.410, л. 346-47。
- ㊲ 1956年4月朝鮮勞動黨三大，中共派遣在黨內地位僅是中央委員的聶榮臻率團出席，就很能說明當時朝鮮問題在中共議事日程中的地位。